

从《四世同堂》和《钟鼓楼》看城市变迁对家庭的影响

李丁丁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0)

摘要:作为独特流派的城市文学,京味小说的发展历程折射出北京城市社会的变迁以及该变迁对城市社会单元——家庭产生的深远影响。《四世同堂》和《钟鼓楼》分别是对京味小说具有开创之功的老舍先生和京味复兴时期刘心武先生之作,对北京市井阶层的关注和描写是两本小说的相似之处。两篇小说中关于家庭结构及家庭成员、家庭成员就业与家庭日常、街坊邻里与人际关系三方面的叙述,充分反映出城市变迁对于家庭的影响。

关键词:《四世同堂》;《钟鼓楼》;城市变迁;家庭结构;家庭日常;人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94(2016)04-0077-06

美国学者理查德·利罕在其著作《文学中的城市》中说:“城市建设和文学文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法国美学家米盖尔·杜夫海纳在《美学与哲学》一书中说道:“当作者通过作品揭示一个世界时,这就是世界在自我揭示。”^[1]由此看来,当一个文人通过文学或者文本来反映和揭示城市时,便形成了城市文学。而当某一富有地域色彩的城市文学形成一种现象或风格,便可“自成一派”,比如京味小说^[2]。

早在清末民初,京味小说就已初露端倪,最早可追溯到文康的《儿女英雄传》、曹雪芹的《红楼梦》。到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老舍先生执笔写“京味儿”才真正开创了京味小说的样式和风格。随着时代发展,北京标志性的文化景观相继被拆毁,北京文化和民俗也逐渐弱化,20世纪50至70年代,京味小说走向没落期。80年代,“文化热”与“寻根文学”兴起,京味被重新理解,关注日常生活以及地域风俗的小说被再度重视,京味小说作为一个真正的文学流派被倡导。

老舍写于20世纪40年代的《四世同堂》与刘心武写于20世纪80年代京味文学复兴时期的《钟鼓楼》,虽跨越近半个世纪,但描绘北京市井阶层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中《四世同堂》以祁家为核心,以小羊圈胡同为主要活动空间,描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北平沦陷后底层市民的荣辱存亡与悲欢离合。而《钟鼓楼》则以薛家为核心,以钟鼓楼一带一个典型的四合院为活动背景,描绘了80年代初北京市民的恋爱嫁娶、喜怒哀乐以及他们之间的差异、矛盾与和睦。家庭作为城市不可或缺的社会细胞,深受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影响,而两篇小说中关于家庭的描写,无疑成为北京城市变迁的折射和缩影。

一、家庭结构与家庭成员关系

家庭结构即家庭成员之间的婚姻、血缘、代际关系及家庭成员数量,有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复合

收稿日期:2016-04-20

作者简介:李丁丁(1992-),女,河北唐县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产业发展。

家庭、单人家庭、残缺家庭和其他家庭等类型之分^[3]。不同的家庭结构形成不同的家庭成员关系,二者不仅受人口要素(婚姻、生育、死亡)的影响,更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而变化。

1. 直系家庭到核心家庭的演变

生活在战乱纷纷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祁家是四代直系家庭的标准代表,这种多代直系的家庭结构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对于富裕阶层来说,多代同堂,人多势众,不仅是家族福禄的代表、社区邻里的典范,更是社会地位和家族实力的象征,便于维护多代累积下的财产和土地。祁家的房虽“没有格局”,“盖得不甚结实”,但“祁老人可是十分喜爱”,原因正是“这是他自己置买的产业”,“看着自己的房,自己的儿孙,和手植的花草,祁老人觉得自己的一生劳碌并没有虚掷”。而对于较为贫困的家庭而言,有限的生产资料难以再分割。相反,人多力量大,分工合作反而利于提高效率。

随着现代化进程,这种直系的大家庭模式不断被瓦解,向核心化和缩小化迈进。首先,改革开放后,西方家庭观念渗透,中国社会逐步发展,个人独立性和私密性增强,不同经历、不同职业的家庭成员距离感加大,新婚夫妇更愿意离开父母独立居住。其次,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对建筑业以及住房属性的认识有了转变,国家、企业、个人参与到城市住房的投资和建设之中,统建房、企业自建自分甚至私人建房使拥有多套住房成为可能^[4]。薛家大儿子薛纪徽及妻子“打结婚那天起就跟单位要房子,总算在今年春天要到了一间……他们搬了出去”。而从张秀藻哥嫂回家探亲以及杏儿拜访荀家的过程可以看出张奇林已婚的儿女、荀家两个已婚女儿均未和父母同住。最后,20世纪70年代首施独生子女政策,强调降低生育率以控制人口数量。澹台智珠在街头看到的“一幅好高好大的宣传画”,“下面写着一行脸盆那么大的字‘为了幸福的今天和美好的明天,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由此,从《四世同堂》到《钟鼓楼》,家庭结构由直系家庭为主向核心家庭为主转变,家庭规模随之缩小,这种家庭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2. 不同家庭结构下的家庭成员关系

日本学者山口守认为,与巴金《家》比较,作品(《四世同堂》)所表现的不是从根本上否定传统的家庭形式,而是对家所象征的古老优秀的中国传统的挚爱^[5]。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体现在《四世同堂》这样一部家族小说便是“家族本位”观念。在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影响下,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体现为一种贵贱长幼和尊卑上下的伦理秩序。《四世同堂》中的“祁家”是“齐家”的谐音,“小顺儿”则是“孝顺”的谐音,“天佑”“瑞宣”“韵梅”,这些温暖吉祥的名字便让人感觉到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关系。父慈子孝:对每个成员充满慈爱的祁老人以及“把委屈放在肚里,把孝心露在外面”的天佑;理解儿子辞职的天佑与“父母在不远游”守着一家老小苟且偷生的瑞宣。婆(翁)慈媳贤:正如同儿子对待父亲,儿媳对待公婆亦是毕恭毕敬,“儿媳见到公公,当然要垂手侍立”。夫唱妇随:韵梅和天佑太太可谓是“三从四德”的真正表率。包办婚姻下的韵梅并不深受“思想新潮”的丈夫的喜欢,但她察言观色,苦苦操劳,努力扮演好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色。此外,书中还提到一喝醉就暴力向妻的小崔以及依然不离不弃的小崔太太;诗酒作伴的钱诗人以及凡事并不多嘴的钱太太;对寡妇外婆言听计从孝心十足的程长顺。

20世纪80年代,婚姻法颁布。男女同工同酬和妇女外出工作使得女性地位得到了提高,夫妻之间虽未完全平等,但夫妻婚后新居制却一定程度上稀释了传统社会的男权制。《钟鼓楼》中提到的多对夫妻的婚姻关系及日常生活:因职业自卑心生猜疑并常与妻子澹台智珠产生矛盾的李铠;女方“四喇叭精神”指导下布置新家、进行婚礼的潘秀娅和薛纪跃;直截了当又庄重平静地对成日做饭洗碗的丈夫葛尊志说出“我不爱你了”的慕樱……妇女家庭地位、婚姻地位以及社会地位的提高使女性摆脱传统的男尊女卑逐渐走向平等甚至强势。与之相随的,婆媳关系既有《四世同堂》中幼对长的敬重,却也体现了平等意识。儿媳孟昭英因在小叔子结婚当天迟迟未到,受到婆婆埋怨并没有忍气吞声,而是压制委屈明白解释。当婆婆再次因为儿子加班数落儿媳时,孟昭英开始了振振有词的辩解,正如书中所

说“毕竟她是新一代的儿媳妇,经济上独立,人格上独立,她凭什么要咽下这口气”,而小说对孟昭英心理活动的描述揭示了新时期儿媳处理婆媳关系的标准:“对呀,我年轻,多干点活应该。可不能因为我是媳妇,你是婆婆,就什么都得我干,你在那儿享受着;谁跟谁都是平等的,家里的事儿,得大伙分担着干。”在新的时代环境下,薛大娘的长者权威因缺乏传统伦理的支撑失去了对晚辈的影响力,更甚的还有以胡爷爷为代表的钟鼓楼下“老人俱乐部”的老人们,常因“儿子冷漠的脸和儿媳妇那对白果一般的眼球”迟迟不愿回到那“晚辈统治的家”。

二、家庭成员就业与家庭日常生活

王安忆曾在《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一文中说过:“我个人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6]由此,社会与城市的变迁并非体现在那些影响深远的大事之中,反而是潜移默化地介入衣食住行、礼仪习俗等家庭日常生活之中。而家庭成员的就业直接关乎家庭的收入和开支,进而影响到家庭消费和日常生活。

1. 家庭成员就业

从“夫为妻纲”到父权制时代的确立,再到“男称丁,女称口,计丁授田”,女性在朝代更迭中一步步丧失了经济地位;“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的分工模式使得女性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成为叱咤风云创造历史的男性的从属,并使女性受教育权利被剥夺。这造就了《四世同堂》中天佑太太和韵梅在家相夫教子、天佑和瑞宣在外挣钱养家的局面。北平沦亡之时的瑞宣先是辞去教堂学校的工作,最后不得已接受富善先生的救济。而像小崔、孙七、刘师傅、程长顺这一类靠手艺和力气吃饭的人更是在战乱时期没有了活路,一天下来几乎开不了张。但也有像冠晓荷、大赤包、齐瑞丰、胖菊子、蓝东阳深受“官本位”思想毒害之流,在国难当头之时东奔西走以谋求一官半职。这种生存局面的产生一方面受到动荡政局的影响,一方面又与政局影响下的通货膨胀、经济萧条有关。而政治与时局介入普通百姓的生存之道,影响到家庭成员的就业,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钟鼓楼下”亦不例外。历经“文革”十年浩劫,从1978年到1982年的四年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拨乱反正、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阶段。在这一时期,从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入手,一系列拨乱反正以及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也成为开启新局面的必由之选。因而,在《钟鼓楼》中,“落实政策”四个字多次被提及,张奇林、澹台智珠、詹丽颖、潘秀娅、海西宾等政治界、科教界、文艺界多个领域的人甚至普通市民因政策落实重返或分配至新的工作岗位。同时,相比《四世同堂》中的妇女极少抛头露面,新中国的成立掀开妇女解放新篇章,实现了几代人的参政梦。“全国人大女代表的人数自1954年第一届至1978年第五届已由147人增长至742人”^[7];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订并颁布;20世纪80年代以来,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使得大多数青少年可以达到初中学历。社会地位、家庭地位以及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得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需要使得更多的妇女投入到合适的工作岗位中去,例如澹台智珠是当红的京剧女演员,詹丽颖是设计院的技术员,潘秀娅在照相馆“站柜台”,孟昭英在丈夫的单位做出纳,张奇林的妻子于咏芝是一名医生,韩一谭的妻子葛萍是一名“有着27年教龄的小学教师”。梁福民和妻子郝玉兰受年龄、学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都在街道工厂当工人,一家人本着“从牙缝里省出来的精神”节俭度日。由此,家庭成员的工作人数、工作性质和工作收入进一步影响了衣食住行的质量甚至礼仪习俗的实施程度。

2. 家庭日常生活

《四世同堂》中被全家视为“和初二十六祭财神一样重要的”祁老人的寿日吃食由之前的“三四桌有海参、整鸡、整鱼的三大件的席”到“酒菜略省一些”再到以吃共和面时用稀有的白面馒头庆寿。而传统热闹的中秋节也由瓜果琳琅、栗大蟹肥到月饼稀少、瓜果罕见再到连兔儿爷都绝了迹。连吃都无法顾及,更不用说穿了。天热起来仍穿着露棉花的破袄的小崔太太;“因为没有一件整大褂”不能来拜寿

的祁家亲友;连活活饿死的小妮子在装殓时都“没有新衣裳,只穿一身过于短小,总还算干净的旧衣服”。夏天还好凑合一些,到了冬天,因为缺煤,连年近八旬的祁老人都不得不蜷缩在冰凉的炕上,“给家里省下一炉火儿”。当然,若在太平年月,20世纪三四十年代北平人的休闲娱乐还是很丰富的:祁老人便“浇浇院中的盆花,说说老年间的故事,给笼中的小黄鸟添食换水,和携着重孙子孙女极慢极慢的去逛大街和护国寺”;钱诗人每天的例行是“浇花,看书,画画,和吟诗”;小孩子们就更好打发了,“胡同里的两株大槐下既无车马,又有槐豆槐花与槐虫可以当作儿童的玩具”;爱热闹的北平人既可观“跑早船或耍猴子的”,又可“每逢七八两日”去护国寺赶庙会。尽管《四世同堂》中所反映的特殊时期的家庭日常生活,但在北平人的回忆中亦可对太平年间的百姓日常略知一二。时光飞逝,1978年改革开放,随着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我国无论是重工业还是关乎生活资料的轻工业都有了迅速的发展。及至80年代,仅从薛家的喜宴上白、红、啤三样酒以及四轮热菜道道色香味俱全还外加一道四喜汤来看,普通市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已经不再是难题。就连生活相对拮据的梁福民家亦能在冬季储存100斤一级菜、200斤二级菜;“穿得并不坏,屋里的家具和床上用品也并不比别家逊色”;早班结束后拿着工会发的电影票去看两部短片甚至“偶尔还买回昂贵的广柑和巴拿马香蕉”。不仅如此,随着健康饮食观念的变化,粗粮开始成为“居民们倒换口味”的桌上新宠,当杏儿去拜访荀家的时候,午饭竟然是特意安排的拌烤羊肉的饽饽。从饭后的咖啡、花蛋糕可以看出,一些西洋饮食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此外,在80年代的钟鼓楼下,布拉吉、雷达表、小轿车、电脑、冯婉珠也喜欢的足球赛、日本丰田等一些新鲜时兴的事物和名词涌入人们的视线和生活,改变着人们的衣食住行以及休闲娱乐。

三、街坊邻里与人际关系

“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一定空间内进行的,因而研究人类文化发展时绝不能忽略地理环境及其作用。西方现代城市学认为:‘自然环境天长日久确实可以给国民的素质以某种决定性的影响。居住环境与国民素质的关系,可以说是反射体的关系’”^⑨。如果说《四世同堂》反映的是北平的“胡同情结”,那么《钟鼓楼》无疑是一种“四合院文化”。生存格局、活动空间塑造着街坊邻里以及人际关系,其变迁亦影响着这种关系。

1. 胡同里的街坊邻里

《四世同堂》中的小羊圈胡同可以说是老舍先生有意设定的生存阈限,这不仅是一个各色人等油盐酱醋、家长里短的活动场,更是一个特殊时期上演悲欢离合、生死惜别的生命场。“它不像一般的北平胡同那样直直的,或略微有一两个弯儿,而是颇像一个葫芦……葫芦的嘴是那么窄小,人们若不留心细找,或向邮差大厅,便很容易忽略过去”。这种闭合的建筑既培养了街坊邻里相互依存的融洽关系,同时又加重了北平人重视人情、崇尚中庸的传统。其中为代表的是李四大爷和李四大妈。“在他的职业上,永远极尽心……在职业外,特别是有了灾难的时节,他永远自动地给大家服务”,而在操办胡同里各家的丧事时,李四大爷总能为邻居能省则省;称全胡同无论美丑的孩子都是“宝贝儿”,能二话不说给小崔拿出二斤杂合面的李四大妈;一辈子省吃俭用却在中秋节下主动端给小崔太太的两盘饺子的马寡妇;全胡同除了冠家,所有邻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钱孟石、钱太太、小崔、李四大爷、小妮子发送丧事。而另一方面,这种生活环境又造成了居民狭隘闭塞、妄自尊大又自私保守的观念:祁老人选房址之时正是看中了胡同口的狭小不惹人注意,十分安全;认定“北平是天底下最可靠的大城,不管什么灾难,到三个月必定灾消难满,而后诸事大吉”。此外,不可否认的是,街坊邻里表面亲和的背后,邻里之间的互助并不是毫无原则绝对无私的,比如为了自保不敢在方六的联名保状上签字;因为粮证发放一事破口咒骂无辜的李四大爷。

然而,无论是自私保守还是互帮互助,都与当时的政局、文化等社会背景分不开。首先,从城市起源上来看,北平是围绕政治权力兴起的城市,无论是“帝京”时期还是“旧京”时期,北平总是和“礼仪之

邦”“帝王之都”联系在一起。尽管在1928年至1949年首都南迁,北平作为文化古都,瑞宣却仍然“自傲生在北平,能说全国尊为国语的话,能拿皇帝建造的御苑坛社作为公园,能看到珍本的书籍,能听到最有见解的言论”。这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已然根深蒂固,难免出现“北平是最可靠的大城”的思想。其次,正是因为政治之城,北平作为必争之地历经沧桑与凌辱,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的民族性格里,也曾有过‘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等特点,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和多次外敌入侵的欺凌,这些美好的人性已经‘萎缩了’下去”。最后,《四世同堂》中的故事发生在特殊的抗日战争时期,按弗洛姆的社会无意识理论:一定的社会环境决定着人们哪些心理能量可以释放,哪些不能释放,而那些大多数社会成员共同的被压抑的领域就是社会无意识^[9]。日本侵华,北平沦陷,太多的社会禁忌使得平民百姓不敢做一些本正确又正当的事。因此,尽管胡同作为一个整体存在,出于自我保守以及利害关系的考虑,家庭与家庭之间不得不分割成为一个个独立的单元,而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80年代更是反盛不衰。

2. 变迁的四合院中的人际关系

四合院在《钟鼓楼》是作为一个主角出现的,正如作者所言:“现在我们走进了钟鼓楼附近的这个四合院,我们实际上就是面对着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市民社会的特定文化景观。”这一典型的外部建筑存在的意义正是为了揭示四合院文化下形成的家庭结构、生活方式以及人际关系^[10]。然而,书中所提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自盖“小厨房”“深挖洞”使得这一四合院已经面目全非。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旧城改造开始,四合院和胡同随之拆迁、改建,人们从平房搬到楼房。与此同时,城市开发使得外来人口流入加剧,繁忙的生活使得交流缺乏,工种和经历的不同导致难以形成共同的精神社区……和谐共处的邻里关系逐渐走向封闭冷漠。在《钟鼓楼》四合院的9户人家中,身为局级干部的张奇林虽极力主张接触群众,但除了接待像荀磊这样的年轻人外,与其他邻居的来往并不多,以至于连同院的编辑韩一谭都不认识。谈及即将搬入楼房,其妻子的话更是侧面道出邻里关系的现状:“到时候你忙个手脚朝天,哪还有回这儿来串门的功夫,只怕你在那儿也结识不了几个新邻居!”住在东屋的梁福民和郝玉兰夫妇因生活拮据,更是“从未见过他家来过客人”。于是,作者总结道:“随着北京四合院的逐步消亡,居民楼的大量涌现,人们的居住空间挨得紧密了,但人们的自然联系也随之淡化,邻居之间大有‘老死不相往来’的趋势,客人来造访时,那一扇紧密的单元门,便缺乏杂居的四合院院门的那种随和感,显得冰冷无情。”

如果说北京历来是礼大于法的人情社会,这种人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变了味,这便是《钟鼓楼》中俯拾皆是的“走后门”。先为躲避上山下乡,后因就业困难,路喜纯所在饭馆的好多年轻人是走后门进来的;荀磊参加的外事部门招考,许多考生请客送礼、以位易位;詹丽颖为了丈夫早日调入北京,“积极地展开了活动”;薛永全失业后靠大姐夫走后门做了喇嘛;就连潘秀娅手腕上那块外地杂牌表都是二嫂走后门买来的所谓“内部试销品”;“文革”上山下乡,父亲费了好大劲把薛纪跃从插队换成去生产建设兵团;就连仅十来岁的姚向东都骄傲地以为“我爸有的是战友,只要我爸一句话,我就能当兵”……小至手表、租车等商品购买,大至上山下乡、就业调动等人事安排,托情、行贿、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的不正当行为仿佛已经司空见惯。这种夹杂着互相利用、暗箱操作的特殊人际关系不得不说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大跃进”和自然灾害使得粮食等农副产品缺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因生产力的低下带来的商品及各种生产资料匮乏,加之我国人口基数庞大,供求难以平衡,20世纪60年代,商品“走后门”现象出现,但当时是极让人难堪的贬义词。历经“文革”的摧残,类似“知青办”这样的“吃得开”的单位已经将“走后门”扩展至人事安置等领域。而至80年代,计划经济进一步加剧了商品需求与供应的矛盾,于是“走后门”逐渐成为中性词,悄悄爬上了台面以至于见怪不怪,反而成为有权势、有身份、有能耐的象征。在“熟稔”取代了“竞争”,“关系”战胜了“契约”,“熟人的情感”淹没了“法律的尊严”,我们必须思考法治社会的当下如何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如何打造纯洁的人文生态?

四、结语

作为城市中的一种社会单元,家庭这一社会契约和制度除了生物本能的属性之外,也深深体现着城市发展和社会变迁的烙印。而这种烙印不仅体现在家庭内部结构、成员关系、收入支出以及日常生活,还波及到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以及整个社会风气和精神文明建设。城市化在带来文明和进步的同时也衍生出一系列不可避免的问题,比如家庭结构变化影响下的养老问题,在缺乏历史故事和文化遗产的大楼里居住和工作所产生的人际交往问题,以及在变迁之中逐渐丢失的本不该丢失的物态的文化遗产和非物态的习俗制度问题。由此,2015年末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强调:要留住城市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等“基因”。在此过程中,作为能动性强的社会和政府,应当跟上这种变化并及时进行引导,避免历史学家王笛在《街头文化》中发出的悲叹:他们失去了一个旧世界,但并没有得到一个新世界。

参考文献:

- [1]信忠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视野中的北京形象[D].长春:吉林大学,2013.
- [2]崔志远.论京味小说[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5(5):44-52.
- [3]王培君.基于城市家庭结构变迁视角的我国养老方式研究[D].上海:上海工程技术大学,2012.
- [4]沈 玲.新中国城市住房供给制度的变迁及思考[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2.
- [5]石兴泽.1999年国际老舍学术研讨会综述[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9(2):137-140.
- [6]王安忆.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155.
- [7]史 界.新时期中国妇女解放理论与实践研究[D].乌鲁木齐:新疆大学,2012.
- [8]宋永毅.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 [9]季乃礼.弗洛姆的社会性格论[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4(6):38-42.
- [10]邹 平.一部具有社会学价值的当代小说——读刘心武的小说《钟鼓楼》[J].当代作家评论,1986(2):110-116.

From *The Yellow Storm and Bell Tower and Drum Tower* to See the Impact of Urban Change on Families

Li Dingding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ollege,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Shandong 266100, China)

Abstract: As a distinct genre of urban literature,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Beijing Flavour Novels reflects the changes of urban society and which impacts on families—the urban social unit. *The Yellow Storm* is created by Lao She who played a pioneering role in development of Beijing Flavour Novels, and besides, Liu Xinwu created *Bell Tower and Drum Tower* during the renaissance. Attention and description of Beijing philistine is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 two novels. The family structure and family members, family members employment and family daily, neighbors and relationships in the two novels, fully reflects the impact of urban change for the family.

Key words: *The Yellow Storm*; *Bell Tower and Drum Tower*; urban change; family structure; family daily; relationships

(责任编辑 王 作)